

神圣与世俗的共生：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演进

李涵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北印度作为南亚文化的核心腹地，其民间音乐剧植根于雅利安文明与本土土著文化的交融沃土，承载着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多元宗教的精神内核，以及农耕文明的生活智慧。

本文以旁遮普邦的伯塔克（Bhangra）、拉贾斯坦邦的卡塔克利（Katkari）、北方邦的乔舞（Chhau）等代表性民间音乐剧种为研究对象，结合宗教仪式、节庆庆典、社会变迁等语境，从艺术表达的本土特质、文化功能的双重维度、当代转型的张力博弈三个层面，系统剖析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发展逻辑与精神内核。研究认为，北印度民间音乐剧始终维系着“神圣叙事”与“世俗表达”的二元共生关系，其艺术形态的演变本质上是宗教信仰、族群记忆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浪潮中，民间音乐剧既面临着商业化异化、传统技艺流失的挑战，也通过青年群体的创新实践、数字化传播实现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北印度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与社会变迁的镜像。

关键词：北印度；民间音乐剧；文化基因；神圣与世俗；当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

北印度涵盖旁遮普、拉贾斯坦、北方邦、哈里亚纳等邦，地理上连接南亚次大陆与中亚、西亚，历史上既是雅利安人迁徙的核心区域，也是伊斯兰文化东传的重要通道，多元文明的碰撞与交融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生态。^[1]民间音乐剧作为北印度文化表达的核心范式，并非孤立的艺术形式，而是融合了音乐、舞蹈、叙事、仪式的综合性文化实践，深深嵌入当地人的宗教生活、节庆庆典与日常劳作之中。从印度教神庙的祭祀歌舞，到乡村集市的节庆表演，从游牧部落的迁徙叙事，到城市街头的文化展演，北印度民间音乐剧以多样的形态，传递着当地人的价值观、审美情趣与集体记忆。

二、研究方法和意义

本文基于田野调查视角与文本分析法，整合北印度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民间音乐剧实践，突破单一剧种研究的局限，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艺术表达如何承载本土文化基因与宗教内核？其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功能如何相互调适并适应社会语境的变迁？在现代化进程中，民间音乐剧如何平衡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实现文化价值的延续与突破？本文所指的“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特指植根于北印度乡村、部落与基层社区，以民间音乐、舞蹈为核心，兼具叙事性与表演性，传承于民间艺人之手，服务于宗教仪式、节庆庆典或日常娱乐的艺术形式，区别于受宫廷文化滋养、遵循严格程式化规范的古典音乐剧。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剖析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核，揭示南亚民间艺术“以艺载道”的独特逻辑，为理解多元文明交融背景下民间艺术的生存机理提供典型案例；同时，通过探讨其当代转型的困境与路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有益启示。

第二章 艺术基因：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本土表达特质

第一节 音乐元素：宗教韵律与世俗节奏的交融

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音乐体系，以“拉格（Raga）”与“塔拉（Tala）”为核心框架，既延续了印度古典音乐的韵律基础，又突破了程式化束缚，融入了民间生活的鲜活节奏，形成了“神圣韵律世俗化、世俗节奏宗教化”的独特特征。

旁遮普邦的伯塔克（Bhangra）音乐剧，其音乐风格极具感染力，是北印度民间音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世俗化类型。伯塔克最初源于旁遮普乡村的丰收庆典，音乐以鼓乐为核心，主要伴奏乐器包括达夫（Dhol，双面鼓）、达姆鲁（Damru，小手鼓）、坦布拉（Tanpura，弦乐器）等，节奏明快强劲，旋律简洁流畅，充满了对丰收的喜悦与对生活的热爱。传统伯塔克音乐的塔拉以“锡克塔拉（Siktaal）”为主，节拍规整有力，舞者随鼓点跳跃、旋转，形成热烈奔放的表演氛围。随着时代发展，伯塔克音乐逐渐吸纳了西方流行音乐的元素，如电吉他、合成器等，节奏也更加多元，但核心的达夫鼓乐与旁遮普民间旋律得以保留，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值得注意的是，伯塔克音乐虽以世俗表达为主，但仍隐含着锡克教的文化基因——歌词中常融入对“Waheguru（锡克教唯一神）”的赞颂，将丰收的喜悦归因于神的恩赐，体现了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的深度绑定。

拉贾斯坦邦的卡塔克利（Katkari）音乐剧，则呈现出强烈的宗教性特质。拉贾斯坦邦是印度教王公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卡塔克利音乐剧最初源于印度教神庙的祭祀仪式，主要演绎《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中的神话故事，传递印度教的伦理观念与精神内核^[2]。其音乐以古典拉格为基础，旋律悠扬肃穆，伴奏乐器包括萨伦吉（Sarangi，弓弦乐器）、塔布拉

(Tabla, 对鼓)、flute (长笛)等,音色柔和典雅,与神话叙事的神圣氛围高度契合。卡塔克利音乐的歌词多为梵语与拉贾斯坦方言的混合,演唱采用“卡塔克(Kathak)”古典舞蹈的唱腔技巧,讲究气息控制与情感表达,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特定的神话场景与人物情感,如表现罗摩与悉多的深情时,旋律舒缓缠绵;表现战争场景时,旋律激昂急促。这种“音乐叙事神话化”的特质,使卡塔克利音乐剧成为印度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音乐形态的传承也遵循着严格的宗教规范,民间艺人需经过系统的宗教与艺术训练,才能准确把握其韵律与内涵。

北方邦的乔舞(Chhau)音乐剧,其音乐则呈现出“宗教与世俗并重”的特征。乔舞源于北方邦的部落文化,最初是部落先民用于驱邪避灾、祈求平安的仪式歌舞,后来逐渐融入印度教神话叙事,成为兼具仪式性与娱乐性的民间音乐剧。其音乐融合了部落鼓乐与古典拉格,伴奏乐器包括恰克(Chak,大鼓)、纳格法尔(Nagfani,蛇形号)、萨罗德(Sarod,弦乐器)等,节奏既保留了部落音乐的原始粗犷,又兼具古典音乐的韵律美感。乔舞音乐的歌词内容丰富,既有对印度教神祇的赞颂,也有对部落生活、爱情故事的描绘,体现了部落文化与印度教文化的交融。在表演中,音乐节奏随舞蹈动作与叙事情节变化,如仪式性段落节奏庄重缓慢,娱乐性段落节奏明快活泼,实现了神圣与世俗的音乐表达的无缝衔接。

第二节 舞蹈与叙事:身体符号与神话世俗的双重表达

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舞蹈元素,始终与音乐、叙事深度绑定,其动作设计源于宗教仪式、生产生活与部落传统,是“身体化的文化叙事”。与古典舞蹈严格的程式化动作不同,民间音乐剧的舞蹈更具灵活性与群众性,既保留了核心的文化符号,又允许艺人根据表演场景与情感需求进行即兴发挥。

伯塔克音乐剧的舞蹈,是北印度民间舞蹈中世俗化表达的典型代表。其舞蹈动作源于旁遮普农民的丰收劳作,如挥镰收割、扬谷脱粒等,经过艺术化加工后,形成了跳跃、踢腿、旋转等核心动作,动作刚健有力、充满活力,展现了旁遮普人的豪爽与热情。在表演中,舞者多身着传统旁遮普服饰,男性穿库尔塔(Kurta)、契诺(Chino),女性穿萨尔瓦卡米兹(Salwar Kameez),佩戴彩色头巾与饰品,随鼓点节奏舒展肢体,集体表演时形成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的视觉效果。伯塔克舞蹈的核心特质在于“参与性”,没有严格的角色分工,观众可随时加入表演,形成“表演者与观众共舞”的热闹场景,这种群众性特征使其成为节庆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

卡塔克利音乐剧的舞蹈,则延续了印度教古典舞蹈的程式化特质,同时融入了民间表演的灵活性。其舞蹈动作以“卡塔克舞”为基础,讲究手部动作(Mudra)、面部表情(Abhinaya)与身体姿态的协调统一,每一个手部动作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寓意,如“阿比扬加手印”代表祝福,“帕达卡手印”代表尊敬,通过精准的动作与表情,演绎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情感与情

节发展。与古典卡塔克舞不同，卡塔克利舞蹈的动作更具表现力与叙事性，艺人会根据神话情节的需要，增加跳跃、旋转等动作，强化表演的戏剧张力。在宗教仪式中，卡塔克利舞蹈的动作严格遵循宗教规范，不得随意改动；而在世俗表演场景中，艺人则会适当简化动作，增强表演的观赏性，实现神圣与世俗的灵活调适。

从叙事逻辑来看，北印度民间音乐剧形成了“神话叙事”与“世俗叙事”两大脉络，二者相互交织、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文化表达体系。神话叙事主要源于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与地方神话传说，核心功能是传递宗教伦理与族群记忆，卡塔克利、乔舞等音乐剧种多采用这种叙事模式。例如，卡塔克利音乐剧常演绎“罗摩救悉多”“克里希纳与拉达的爱情”等经典神话故事，通过音乐、舞蹈与旁白的结合，将印度教的“达摩（Dharma，法）”“业（Karma，因果）”“摩克沙（Moksha，解脱）”等核心观念传递给观众，实现宗教教化的功能。

世俗叙事则聚焦于民间生活、爱情故事、族群历史与社会现实，伯塔克、部分乔舞音乐剧采用这种叙事模式。其叙事内容贴近基层民众的生活，语言多为地方方言，通俗易懂、充满生活气息。例如，传统伯塔克音乐剧的歌词多描绘丰收的喜悦、爱情的甜蜜、家庭的和睦等日常场景，如“金黄的麦子堆满仓，达夫鼓声响四方，我们唱歌又跳舞，感谢神明赐安康”，简单直白的歌词的搭配明快的音乐，传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世俗叙事也逐渐融入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如对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流失的忧虑、对贫富差距的反思等，使民间音乐剧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载体。

第三节 表演场景与艺人传承：群众性与口头性的核心特质

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表演场景具有强烈的“场景化”特征，不同的剧种对应不同的表演场景，场景与表演内容、形式相互适配，形成了“场景决定表达”的艺术逻辑。宗教类民间音乐剧（如卡塔克利）的核心表演场景是印度教神庙、宗教节日庆典（如排灯节、洒红节），表演内容以神话叙事为主，形式庄重肃穆，旨在实现宗教教化与精神寄托；世俗类民间音乐剧（如伯塔克）的表演场景则更为多元，包括丰收庆典、婚礼、集市、社区活动等，表演内容贴近生活，形式热烈奔放，旨在营造欢乐氛围、维系族群情感。

艺人传承体系是北印度民间音乐剧得以延续的核心保障，其传承模式以“口头传承+师徒相授”为主，兼具家族传承与社群传承的特征。多数民间艺人来自底层社群或部落，自幼跟随长辈或名师学习，通过口传心授、耳濡目染的方式，掌握音乐、舞蹈、叙事的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这种传承模式强调“实践优先”，艺人无需系统学习理论知识，而是在长期的表演实践中，理解并内化艺术的精髓。例如，拉贾斯坦邦的卡塔克利艺人，多来自世代传承的艺术家族，家族长辈会将神话故事、音乐旋律、舞蹈动作等知识，通过口头传授与示范表演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同时强调对宗教信仰的坚守，确保艺术形式的文化本真^[3]。

值得注意的是，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传承并非僵化的复制，而是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艺人会根据时代变化、观众需求与表演场景，对音乐旋律、舞蹈动作、叙事内容进行适度调整，使艺术形式始终适应社会语境。例如，旁遮普邦的伯塔克艺人，在保留核心鼓乐与舞蹈动作的基础上，将现代生活元素融入歌词，如对城市生活、科技发展的描绘，同时借鉴现代舞蹈的编排技巧，增强表演的视觉效果，使传统艺术形式获得当代生命力。这种“传承中创新”的特质，是北印度民间音乐剧能够跨越千年延续至今的关键所在。

第三章 文化功能：神圣与世俗的双重维度及其调适

第一节 神圣功能：宗教教化与族群记忆的载体

北印度作为印度教的发源地与核心区域，宗教信仰深刻影响着民间艺术的发展，民间音乐剧的神圣功能主要体现在宗教教化、精神寄托与族群记忆传承三个方面，成为维系宗教信仰与族群文化的重要纽带。

宗教教化是民间音乐剧神圣功能的核心体现。印度教强调“达摩”“业”“摩克沙”等核心观念，通过神话故事传递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而民间音乐剧则成为这些观念的“具象化表达”载体。卡塔克利音乐剧作为印度教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便是通过演绎《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中的神话故事，向信众传递印度教的伦理观念与价值追求^[4]。例如，在“罗摩救悉多”的叙事中，通过罗摩的忠诚、勇敢与正义，以及悉多的纯洁、坚韧，向观众传递“善恶有报”“坚守正义”的伦理准则；在“克里希纳与拉达的爱情”叙事中，通过二人的深情与奉献，诠释印度教“梵我合一”的精神追求。这种“以艺载道”的方式，相较于枯燥的宗教说教，更具感染力与说服力，能够深入基层民众的内心，实现宗教教化的目的。

精神寄托功能则源于基层民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印度历史上战乱频繁、自然灾害多发，基层民众长期面临生存压力，民间音乐剧成为他们缓解焦虑、寻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在宗教仪式中，通过参与民间音乐剧的表演与观赏，信众能够感受到神明的庇护，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力量；在遭遇苦难时，艺人会通过演绎神话故事中神明战胜邪恶、苦难终会过去的情节，给予民众希望与慰藉。例如，在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过后，拉贾斯坦邦的村民会组织卡塔克利音乐剧表演，赞颂湿婆神、毗湿奴神的神力，祈求神明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表演不仅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更是民众应对苦难、寻求精神寄托的方式。

族群记忆传承功能则体现在民间音乐剧对族群历史、文化传统的记录与传递。北印度的许多部落与社群，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民间音乐剧成为记录族群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的重

要载体。例如，北方邦的乔舞音乐剧，记录了部落先民的迁徙历程、狩猎生活与驱邪仪式，通过代代相传的表演，将族群的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传递给后代，强化族群的集体认同感。在宗教融合的过程中，民间音乐剧也记录了不同宗教文化的交融历程，如拉贾斯坦邦的部分民间音乐剧，融入了伊斯兰教苏菲派的音乐元素与叙事主题，既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内核，又吸纳了伊斯兰教的精神理念，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

第二节 世俗功能：娱乐消遣与社会整合的纽带

除了神圣功能，北印度民间音乐剧还承担着丰富的世俗功能，涵盖娱乐消遣、社会整合、文化认同构建等多个方面，深深嵌入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维系社会秩序与族群关系的重要纽带。

娱乐消遣是民间音乐剧最基础的世俗功能。北印度的基层民众，尤其是乡村与部落居民，生活节奏缓慢、娱乐方式单一，民间音乐剧成为他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缓解劳作压力的重要途径。在丰收庆典、婚礼、集市等场景中，民间音乐剧的表演能够营造热烈欢乐的氛围，让民众在音乐与舞蹈中释放情绪、享受生活。例如，旁遮普邦的丰收节期间，乡村各地都会举办伯塔克音乐剧表演，村民们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饮酒欢庆，持续数日，成为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这种娱乐性特征，使民间音乐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跨越年龄、性别、阶层的界限，吸引不同群体的参与。

社会整合功能则体现在民间音乐剧对族群关系、社群秩序的维系与协调。北印度是多族群、多宗教共存的区域，民间音乐剧通过集体性的表演实践，打破族群、宗教、阶层的界限，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集体表演中，参与者无论身份高低、贫富差异，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其中，通过共同的音乐与舞蹈，培养集体意识与协作精神，化解矛盾与冲突。例如，拉贾斯坦邦的沙漠地区，多个部落共存，不同部落有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但在宗教节日庆典中，各部落都会参与卡塔克利音乐剧的表演，通过共同演绎神话故事，增进彼此的理解与认同，维系部落之间的和平共处。此外，民间音乐剧还能够强化家庭与社群的凝聚力，在婚礼、丧葬等家庭与社群活动中，音乐剧表演成为连接家庭成员与社群成员的纽带，传递亲情、友情与社群关怀。

文化认同构建功能则体现在民间音乐剧对地域文化与族群文化的彰显与强化。北印度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音乐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族群特征，这些特征成为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重要标识，同时也成为构建地域与族群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例如，伯塔克音乐剧成为旁遮普人的文化符号，无论是身处本土的旁遮普人，还是旅居海外的旁遮普侨民，都通过伯塔克音乐与舞蹈，表达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眷恋；卡塔克利音乐剧则成为拉贾斯坦邦印度教社群的文化标识，通过传承与表演，强化社群成员对印度教文化与拉贾斯坦地域文化的归属感。在后殖民时代，民间音乐剧的文化认同功能进一步凸显，成为北印度各邦彰显地域

文化特色、构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第三节 神圣与世俗的动态调适：语境驱动的功能转型

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神圣与世俗功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社会场景中进行动态调适，形成“语境驱动功能转型”的逻辑。这种调适既体现了民间音乐剧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也反映了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审美需求的变迁。

殖民时期，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传统文化采取压制与改造政策，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民间音乐剧的神圣功能被削弱，世俗功能逐渐凸显。为了规避殖民当局的文化压制，民间艺人开始弱化音乐剧的宗教叙事，强化世俗主题，将表演场景从神庙、宗教庆典转向乡村集市、私人聚会等场所，同时吸纳西方文化元素，对艺术形式进行创新。例如，旁遮普邦的伯塔克音乐剧，在殖民时期逐渐摆脱宗教束缚，成为独立的世俗娱乐形式，表演内容更加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甚至融入对殖民统治的隐晦批判，成为民众表达不满、凝聚反抗力量的载体。

后独立时代，印度政府致力于构建统一的国家文化认同，同时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民间音乐剧的神圣与世俗功能实现了新的平衡。一方面，政府将部分民间音乐剧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支持宗教类音乐剧的传承与发展，强化其神圣功能与文化传承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的审美需求日益多元化，民间音乐剧的世俗功能进一步拓展，成为城市文化展演、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例如，拉贾斯坦邦的卡塔克利音乐剧，既在神庙中保留传统的祭祀表演，又在旅游景区、文化节中进行商业化展演，神圣功能用于传承文化、维系信仰，世俗功能用于满足游客需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二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第四章 当代转型：现代化浪潮中的张力博弈与发展路径

第一节 当代转型的核心张力：传统坚守与创新突围的博弈

传统坚守与创新突围的博弈，是北印度民间音乐剧当代转型面临的核心张力。传统是民间音乐剧的文化根基，承载着族群记忆、宗教信仰与艺术精髓，失去传统便意味着失去文化本真；而创新则是民间音乐剧适应现代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缺乏创新便会陷入僵化，被时代所淘汰。这种张力在音乐、舞蹈、叙事与表演形式等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

在音乐层面，传统坚守者强调对古典拉格、塔拉体系与民间乐器的严格传承，反对吸纳西方流行音乐元素与现代乐器，认为这种融合会破坏民间音乐的本土特质与文化本真。例如，部分传统卡塔克利艺人坚持使用萨伦吉、塔布拉等传统乐器，严格遵循古典拉格的韵律规范，

拒绝使用电吉他、合成器等现代乐器，认为现代元素的融入会弱化音乐的宗教神圣性。而创新派艺人则主张打破传统束缚，积极吸纳西方流行音乐、爵士乐、摇滚乐等元素，对传统旋律与节奏进行重构，同时引入现代乐器，增强音乐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以适应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例如，当代伯塔克艺人将电子音乐与传统达夫鼓乐融合，创作出台风强劲、节奏多元的现代伯塔克音乐，在社交媒体与音乐平台广泛传播，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

在舞蹈与叙事层面，传统坚守者强调对程式化动作、神话叙事与宗教符号的严格传承，反对随意改动与世俗化解读，认为这会消解民间音乐剧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而创新派艺人则主张简化程式化动作，增强舞蹈的视觉冲击力，同时拓展叙事主题，将现代社会议题（如城市化、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融入叙事，使民间音乐剧更贴近现实生活，引发当代观众的共鸣。例如，北方邦的部分乔舞艺人，在保留核心舞蹈动作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舞蹈的编排技巧，同时将“乡村青年进城务工的困境”“女性权益保护”等主题融入叙事，使传统音乐剧成为反映现代社会现实的载体。

第二节 商业化与数字化：机遇与异化的双重影响

商业化与数字化是推动北印度民间音乐剧当代转型的两大重要力量，二者既为民间音乐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文化异化的风险，形成了“机遇与异化并存”的复杂局面。

商业化对民间音乐剧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商业化资本的介入与旅游产业的发展，为民间音乐剧提供了更多的表演平台与经济收入，缓解了传承资金不足的困境，促进了民间音乐剧的传播与推广。例如，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等旅游热点地区，将民间音乐剧纳入旅游演艺项目，在景区、酒店等场所进行常态化表演，既满足了游客对本土文化的体验需求，又为民间艺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使民间音乐剧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商业化推动民间音乐剧进行艺术创新，艺人通过优化表演形式、提升观赏性，适应市场需求，使传统艺术形式更具当代生命力。

另一方面，过度商业化容易导致民间音乐剧的文化本真异化，陷入“为迎合市场而牺牲传统”的困境。为了吸引游客、追求经济利益，部分艺人简化甚至篡改民间音乐剧的核心技艺、叙事内容与文化符号，将其变成“快餐式”的文化表演，失去了原有的宗教内涵与文化深度。例如，部分旅游景区的卡塔克利音乐剧，为了缩短表演时间、增强观赏性，大幅简化神话叙事与程式化舞蹈动作，过度强调视觉效果与娱乐性，使原本庄重肃穆的宗教音乐剧变成了单纯的娱乐表演，其神圣功能与文化内涵被严重消解。此外，商业化还导致民间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趋同，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民间音乐剧逐渐失去鲜明的地域与族群特征，陷入“同质化”的困境^[5]。

但数字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数字化传播使民间音乐剧的表演场景脱离了

原有的文化语境，观众难以理解表演背后的宗教内涵、族群记忆与文化符号，导致文化价值的碎片化解读。例如，海外观众通过社交媒体观看伯塔克音乐剧，往往只关注舞蹈的视觉效果与音乐的节奏感，而忽视了其背后的丰收文化、锡克教信仰等核心内涵，使民间音乐剧的文化价值被弱化。另一方面，数字化传播加剧了民间音乐剧的商业化与娱乐化，部分艺人为了追求流量与关注度，刻意迎合网络审美，过度包装表演内容，甚至篡改传统技艺，导致文化本真的流失^[6]。

第三节 当代转型的可行路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面对现代化浪潮中的张力与挑战，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当代转型，不应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应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路，在坚守文化本真的基础上，通过适度创新、多元融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这种路径需要政府、社会组织、民间艺人与青年群体的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传承与发展体系。

坚守文化本真是民间音乐剧当代转型的核心前提。民间艺人应坚守民间音乐剧的核心文化基因，包括传统音乐韵律、舞蹈动作、叙事主题与文化符号，保留其宗教内涵与族群记忆，避免因过度创新或商业化而失去文化本真。同时，应加强对传统技艺的系统传承，通过家族传承、师徒相授、专业教育等多种方式，培养年轻传承人才，确保传统技艺的代代相传。例如，拉贾斯坦邦的部分民间艺术学校，开设卡塔克利音乐剧专业课程，既教授传统音乐、舞蹈与叙事技艺，又讲解印度教文化、族群历史等理论知识，培养兼具技艺与文化素养的年轻艺人，为传统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适度创新是民间音乐剧适应现代社会的关键。创新应基于传统，而非脱离传统的颠覆式改造，重点在于拓展艺术表达形式、丰富叙事主题、适配现代审美需求。在音乐层面，可以在保留传统拉格、塔拉与民间乐器的基础上，适度融入现代乐器与流行音乐元素，增强音乐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但需避免过度西化；在舞蹈层面，可以简化部分复杂的程式化动作，融入现代舞蹈的编排技巧，增强表演的视觉冲击力，同时保留核心动作与文化符号；在叙事层面，可以在传统神话与世俗叙事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社会议题，使民间音乐剧更贴近当代观众的生活与情感，引发共鸣。例如，当代伯塔克艺人创作的《城市中的伯塔克》，保留了传统达夫鼓乐与舞蹈动作，同时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变迁融入歌词，既延续了传统，又反映了现代社会现实，获得了年轻观众的认可。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支持是民间音乐剧当代转型的重要保障。政府应加大对民间音乐剧的保护与扶持力度，将更多优秀民间音乐剧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设立专项传承资金，支持民间艺人的技艺传承与创新实践，同时加强对旅游演艺市场的规范与引导，遏制过度商业化与文化异化。社会组织可以搭建民间音乐剧的传播与交流平台，举办文化节、展演活动、学术研讨会等，促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民间音乐剧的交流与融合，提升民间音乐剧的社会

影响力与文化地位。例如，印度国家文化部门每年举办的“北印度民间艺术 festival”，汇聚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剧艺人，通过展演、交流与研讨，推动民间音乐剧的传承与创新^[7]。

发挥青年群体的作用是民间音乐剧当代转型的核心动力。青年群体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具有敏锐的审美洞察力与创新能力，能够推动民间音乐剧实现年轻化与现代化转型。应鼓励青年群体参与民间音乐剧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开设 workshops、文化体验活动等，激发青年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兴趣，引导他们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传播手段与创新理念，为民间音乐剧注入新的活力。例如，部分年轻艺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传播民间音乐剧的传统技艺与创新作品，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同时与其他领域的创作者合作，将民间音乐剧元素融入流行音乐、影视、动漫等作品中，拓展民间音乐剧的传播边界与应用场景。

第五章 结语

一、个人思考

民间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在地性”与“群众性”。北印度民间音乐剧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源在于其深深植根于北印度的本土文化土壤，贴近基层民众的生活与信仰，是民众情感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载体。这种“在地性”使民间艺术具有不可复制的文化特质，成为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重要标识；而“群众性”则使民间艺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能够跨越阶层、年龄的界限，实现代代相传。在全球化浪潮中，民间艺术的“在地性”与“群众性”面临着被消解的风险，如何守护这份独特的文化价值，是所有民间艺术传承者与研究者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民间艺术的当代转型，不应是“被动适应”，而应是“主动引领”。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创新实践表明，民间艺术并非落后、僵化的传统符号，而是具有强大适应性与创新潜力的文化资源。通过与现代审美、数字技术、社会议题的结合，民间艺术能够突破传统边界，成为反映当代社会现实、引领文化潮流的重要力量。例如，北印度青年艺人将民间音乐剧元素融入流行文化，不仅推动了传统艺术的传播，也为流行文化注入了本土灵魂，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潮流。这种“主动引领”的转型方式，能够让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新的定位，实现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

同时，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需要超越“单一传承”的思维，构建“生态化传承”体系。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传承困境，本质上是其生存的文化生态被破坏的结果——城市化导致乡村社群瓦解，西方文化冲击导致本土审美异化，商业化导致文化本真流失。因此，民间艺术的传承，不仅要传承技艺本身，更要修复其生存的文化生态，包括保护传统表演场景、

培育民间艺术氛围、强化族群文化认同等。只有构建起“技艺传承—生态保护—创新发展”的完整体系，民间艺术才能真正实现活态传承，在现代化浪潮中永葆生机。

二、深层结论

第一，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共生体”。其艺术形态与文化功能，始终围绕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展开，神圣功能承载着宗教教化、精神寄托与族群记忆的传承，世俗功能承担着娱乐消遣、社会整合与文化认同的构建，二者相互交织、动态调适，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这种共生关系，是北印度民间音乐剧能够跨越千年延续至今的核心密码，也是其适应不同历史语境与社会场景的关键所在。

第二，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艺术演进，是“文化基因传承与社会语境重构”相互作用的结果。艺术基因中的本土特质与宗教内核，为民间音乐剧提供了稳定的传承基础；而社会语境的变迁（如殖民统治、城市化、全球化），则推动民间音乐剧不断调整艺术形态与功能定位，实现适应性转型。这种“传承与重构”的辩证关系，使民间音乐剧既保留了文化本真，又获得了时代生命力，成为社会变迁的镜像。

第三，北印度民间音乐剧的当代转型，核心是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博弈，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度坚守传统会导致艺术形式僵化，脱离时代；过度创新或商业化则会导致文化本真异化，失去灵魂。只有在坚守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通过适度创新、多元融合，构建政府、社会组织、艺人与青年群体协同发力的传承体系，才能实现民间音乐剧的当代复兴。

参考文献

- [1] 拉马钱德拉·古哈. 印度的历史与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2] 安妮塔·德赛. 印度民间艺术的精神内核[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 [3] 维贾伊·普拉沙德. 南亚文化交融中的民间艺术[J]. 国际文化研究, 2017 (04): 56-68.
- [4] 李明达. 北印度卡塔克利音乐剧的宗教叙事与文化功能[J]. 南亚研究, 2020 (02): 112-125.
- [5] 沙希德·阿赫塔尔. 商业化语境下北印度民间音乐的转型[J]. 印度艺术研究, 2018 (03): 78-90.
- [6] 拉吉夫·梅农. 数字化时代印度民间艺术的传播与传承[J]. 新媒体研究, 2021 (06): 34-42.
- [7] 王丽娜. 南亚民间艺术的当代转型路径探析[J]. 世界民族, 2022 (03): 89-97.

The Symbiosis of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Cultural Genes and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North Indian Folk Musical Theater

Li H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ity,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As the core cultural region of South Asia, the folk musical dramas of North India are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the fusion between Aryan civilization and indigenous cultures, carrying the spiritual cores of diverse religions such as Hinduism and Islam, as well as the life wisdom of agrarian civiliz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representative folk musical drama genres such as Bhangra from Punjab, Katkari from Rajasthan, and Chhau from Uttar Pradesh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mbines the contexts of religious rituals, festival celebrations, and social change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logic and spiritual core of North Indian folk musical drama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dual dimensions of cultural functions, and the tension and game of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North Indian folk musical dramas have always maintained a dual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sacred narrative" and "secular express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ir artistic forms is essentially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s, ethnic memori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waves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folk musical dramas not only face the challenges of commercial alienation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skills, but also achiev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s through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the youth and digital dissemination, becoming the core carrier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mirror of social change in North India.

Keywords: North India; folk musical drama; cultural genes; sacred and secular;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